

钱穆作品系列



中国史学发微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钱穆作品系列



中国史学发微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著作权所有：©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境内（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除外）独家出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散布、销售。版权所有，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，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、机械、影印、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。

序 一

中国学业相传，向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经学最早，但实惟有《诗》《书》两部。《诗》三百，迄今犹存。《书》则惟商、周两代少数几篇政治文件，或最先当起于盘庚以后。至唐、虞、夏代，如《尧典》《禹贡》之类，皆出战国后人撰写，非孔子前所有。至于礼，《论语》：“子所雅言。《诗》《书》执礼。”则礼非成书，故称“执礼”，与《诗》《书》不同。《仪礼》仅属士礼，乃孔子以下人所造。《周官》更属后起，当在战国之晚世，或当在虞、夏书之后。乐则无专书记载。即孔子时，郑、卫之声，已非古乐。孔子在齐闻韶，韶乐乃自陈达齐，但亦决非传自舜代。惟在孔子时，已属南方之乐之稍古仅存者。至孟子时，古乐今乐已显相分别。《易》虽古代相传，但孔子时亦仅为一卜筮之书。《易传》则当出秦始皇时代，已杂采儒道两家义成书。孔子前虽有《诗》《书》，亦不称之为经。盖古代学术尚未流通，惟政府最高层始掌有之。故孔子曰：“春秋天子之事。”

学术传于社会下层，其事始于孔子。战国诸子著书，墨家最

先有经。汉代诸儒以孔门相传有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之学，遂误称六经。而实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易》及孔子《春秋》，只五书，尚缺一《乐经》。汉武帝乃立五经博士，后代经学惟五经有传记注疏，此外不再有增。则虽有经学之名，而其学术相传，则惟传达，无创作，与史、子、集三部有不同。

先秦诸子相传为九流十家，最先起者为孔门儒家。孔子为中国自古相传私人讲学之始，前后门弟子共七十七人，后世讹称七十二人。然姓字见于《论语》者，不达半数。《论语》乃孔门师弟子相聚讲论语言之记载。然其书相传，至孟子后，始正式编纂为上下二十篇。故在孟子书中，亦尚不见《论语》一书名。墨翟继孔子而起，但墨家先有成书。如今传《墨子》及《墨经》，其书皆出《论语》为书行世前。其他各家成书，则全出儒、墨后。但独有小说一家，则其成书当尚有在孔子之前者。

九流各成一家之言，以其门弟子相聚相传，如同属一家，故称家言。家族之家，指血统言。诸子成家，乃指其所讲贯之道统言。独小说家则不然，因小说家所汇集之诸书，尚远起在孔子儒家讲学之前。古代有史官，由周天子分派于列国诸侯间，世袭其位。又有正史、稗史之别。正史居诸侯之国都，稗史则散居国都外城乡间。其有关稗史所记载之文字，散见于今传《左传》诸书中者，尚不少。余已在他篇论及，此不详。战国小说家言，则即由其时之稗史来。

如是则在子学中，岂不即包涵有史学。其实不止于此，即如纵横家言，岂非即战国时代有关当前国际事件一种互相分派之争论与抗议。其实尚不止此，即如孔子为儒家开山，但“甚矣吾

衰也。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”。又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。”则孔子之意，乃欲上承周公。后儒则又自周公上推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唐、虞、三代。墨翟继孔子起，自为家言，则曰：“非大禹之道，不足以为墨。”是墨家于唐、虞、三代中，独取夏禹一人为法。道家继儒墨而起，乃更上推黄帝，而唐、虞、三代皆在其下。但又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，创为农家言。其次如阴阳家，则庖牺氏、神农氏、黄帝、尧、舜以至三代，凡中国史历古相传诸帝王，皆在网罗取法之中。而秦之统一，则其君自称始皇帝，是亦上承杂家吕不韦《春秋十二纪》来。则凡先秦诸子学，实可谓乃无一而非源自史学。

此后汉代史学继起，其太史官司马谈讨论六家要旨，而私意所宗，则更在道家。其子司马迁继之，乃益尊儒家，故既为《孔子世家》，又作《孔子弟子列传》与《孟荀列传》，于诸子中最为特出。其《自序》则曰：“通天人之际，明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。”是史迁之为史，亦求上承诸子立言成家。则子史之学，自古人视之，其间实无大分别。此后二十五史以及三通诸书，乃亦如诸子，各成家言。尤可以宋代之欧阳修之为例。如此中国之子学与史学，岂不貌分而神合，可离而可通乎？

再次言及集部。集部有骈散之分。最先骈体肇始于屈原之《离骚》。诗、骚并言，则《离骚》亦可谓乃上自经来。太史公以屈原与贾生并传，贾谊《治安策》，乃汉初一名奏议，则《离骚》岂不亦可通于子与史。其下乃有三国时代之建安文学，乃始由西汉自《离骚》转为骈体辞赋，又转入散文中来。如曹操之奏议诏令，皆可纳入文学之集部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，亦入集部。实则

此等文字，皆亦子亦史。又如晋、宋时代之陶潜，其所为诗辞传记，如《归去来辞》，如《桃花源记》诸文，皆即其一人之史，亦即其一家之言，岂不史与子与集之三部，实可通而为一乎？

唐代韩昌黎唱为古文，乃始正式由骈变而为散。其自言：“好古之文，好古之道也。”则其言亦子亦史。一人之集，至少乃为其一人之自传，亦即当归入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道统中。故集部兴起，乃为四部之最后。其实古代之经，如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尤其如古诗三百首，岂不亦如后代文学一集部。亦可谓集部即是子，但较单纯而已。而其当可列入史部，则更不待论。是则中国四部之学，其实约略言之，只是子、史之两部分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又与其门弟子所言合成一《论语》。《春秋》经而即史，而《论语》是子，但亦可称为一集部。是则孔子一身已兼有了四部之学，故后人尊之为至圣先师。

此下于四部之学最有完整成就者，当推北宋时代之欧阳修，其生平著述，可谓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皆备。如其为《新五代史》，乃史部之正宗。又兼修《新唐书》，亦入二十五史中。而其于经学，皆有成书。其于《诗经》方面姑不论，而其于《易经》，疑《易传》非孔子作，此乃自孔子以来，一千年后始发其议。欧阳子自谓再历一千年又有第二人，两千年可得第三人，三人为众，则此一人所疑，二千年后，即当成为众人之所疑矣。此其运思持论，何等高明而广大，悠久而深沉。可见由一人之学而成为家学，由一家之学而成为千古之群学，即道统所存，即于欧阳修一人之身，亦已明白暴露无疑矣。

又欧阳修之文，上承韩愈。而其辟佛，则成为《本论》。以

一人之所疑，所反对，化而为全国之政教，此即由集为子一明证。故由欧阳一人，而中国四部之学之可得达成于一家，亦即明白可证矣。

余此书专为史学发微，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学，不能通古今之变而成其一家之言，又何得成为一史家。上之如汉代之司马迁，后之如宋代之欧阳修，皆可为明证。惟孔子则尤其为至圣先师，为一切中国学人之最高楷模。此则治中国学术，皆当以此为法。此非空言，乃实际标准之所在，则尤贵学者之能深思而明辨之。心知其意斯可矣，又何贵于繁言与空论。

一九八七年一月钱穆识于台北士林

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

序 二

西方人重空间观,但缺时间观。古希腊人即有几何学,作航海测量之用,但几何学非以测时间。中国古人,则立标测日影,即知重时间。又曰: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”雄鸡司晨,亦以测时间为重。

阿剌伯人有《天方夜谭》,其间有“能言鸟”一故事。三兄弟同求能言鸟,两兄已失踪,其弟继续追求。一术士告之,循山路上行,路旁有呼声,勿回顾,则能言鸟易得。其弟乃塞耳上山,路旁丛石耸立呼喝不已,逾上则石愈多,声愈大。其弟因已塞两耳,幸能终不回顾。竟得能言鸟所在,取之以归。路旁石皆起立重得为人。盖皆来寻能言鸟者,闻声回顾,遂化成石。此亦如人读史,过重以往,乃随前人过去,亦如失败,无以向前。历史乃前人一切以往故事,可称已均属失败。回读史籍,亦如人重蹈覆辙,自陷深渊,重归失败。能言鸟故事即此意。古希腊滨海而居,非出国渡海,远向他邦,即无以经商,亦即无以为生。阿剌伯人居沙漠中,非渡越此沙漠,生命亦无前途。故此两种人,多主

向前,不重回顾。历史故事皆属以往,非彼辈所当流连。

耶稣则犹太人,其创始宗教,乃谓人生从天堂降谪,死后将重返天堂,俾得安居。恺撒事恺撒管,历史则属人间事,全属恺撒,为上帝所不管。信奉宗教,自不留心历史。西方文化会合此轻视历史之三大渊源,遂无史学可言。

中国人则谓:“前车之覆,后车之鉴。”前人随时过失,后人即当警戒。并且前世以往亦并非无成功之处,亦可资后人以承袭与模仿。历史教人向前,即因其能知过善改,亦因其能善所承袭。西汉人言:“自古无不亡之国。”其时则中国历史已历两千年以上,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以迄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,以至秦汉,一部两千年以上之历史,岂不告人以人类已往,历史有得有失,有成有败,使人知所警惕,有过能改。则过而常存,去而复来,乃得依然向前。人生遂能发出前所未有之聪明与措施,而改善其将来。如此则历史所记乃人道,实亦即天道。人类智识贵在此不断过程中,求获将来之新得。故曰:“所过者化,所存者神。”如人一日三餐,有排泄,但亦有存留。惟其所存留已非故物,因谓之化。化则非属过去,故曰:“所存者神。”庄周言:“万物一也。是其所美者为神奇,其所恶者为臭腐。臭腐复化为神奇,神奇复化为臭腐。故曰通天下一气耳。”是则历史非尽属过去,乃成一种神化作用。西方人轻视历史,则过去尽成臭腐,如希腊,如罗马,乃至如近代之英法,不久亦当全成为臭腐。而中国则上下五千年通为一体,尽成神奇,此岂西方之所有。人文学中之史学,其功用乃如是。

《易》言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必经以往过失,始得继续生

存。孔子曰：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”过去与将来，即属人生之两端。当前现在，则是其中。历史可贵处，即在其属于过去之一端。不断过失，实亦为不断存在之前因。即在此过失中，求一不断之向往。倘尽放弃其一切过去于不顾，则此端既不存在，亦即无其他一端可言。既无过去，亦即无将来，更又何从寻得一向前之生路。中国人言：“死生存亡”，此即两端。不死又何有生，不亡亦何有存。

中国人又言“道”字。道即一条路，向前一步，则失去了其走过之一步。其实就其不断向前言，则一步过去，亦即是一步完成。但当求前途之所止。而人生无穷，则其前途亦无止。故步步向前，非只是步步过去，实亦是步步完成。人类历史正如此。司马迁引诗以赞孔子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之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此见人类远大成功之一境，亦即无可至不能止之一境。而景行行之之逐步骤，则亦尽在逐步向前之途上。即过失，亦进步，同时亦即是完成。此则中国人之历史观。

余尝谓人生即历史。人生之最要过程在能知过勿惮改。历史亦然。孔子时时梦见周公，但其老年则曰：“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周公在孔子当时，实已成为一过去人物，亦可谓一失败人物。倘周公不过去不失败，则周室亦不东迁。故孔子又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。”则孔子已知周公当年之道，不复可行于孔子之时矣。孔子又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”此亦如周礼能言，而鲁不足征。其言不足征，即犹言过去之亡失。但亡失者乃其事，非其道。又曰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。”杞、宋不足征，

即夏、殷两代已在过失中。鲁不足征,即周公与西周亦尽在过失中。其或继周者,有继周而起,此即自古无不亡之国之先声。历史在过去中,乃指其事,非言其道。而人生则贵在有将来。但非有过去,又何得有将来。是则历史即人生,但可谓乃指其前一半之已过已失言,非指后一半常存常在之将来言。而将来之可知,则即在过去中。虽可知而不可知,虽不可知而仍可知。此则读史而明其道乃可知。

故人道即天道,当前之中国,或可谓孔子已先知之。所以孔子往日之所言,至今仍有可用。以今日世界之情况言,亦可谓早在孔子之预见中。然而孔子之在今,岂不亦已成为一过去人物。孔子之所言,迄今已两千年,早已过去,又岂得一一有用?是则贵在传孔子之道者,斟酌而善行之。果尚求为东周,则尽人而明知其非矣。但此孔家店,则仍然不得打倒。此则当前之中国人,又谁欤能深识其意旨之所在。

知过去乃知将来,知亡失乃知存在。西方人不肯认有过,又不喜言亡失,故不爱言历史。其所言之历史,则尽属成功一方面,如言希腊史、罗马史,以迄于最近之英法史,当前之美苏史,莫不皆然。使人仅见有当前之形成,而不见有以往之过失。则试问个人人生又焉得仅有生存,而无死亡。西方之耶稣教言,人死仍有灵魂上天堂,则正是此义。

中国人贵能知过,又贵能改过,故其言历史亦常在言人生之过失处。知得人生已往之过失,则亦易知当前及将来之所得完成。西方人则仅知此一端,不知彼一端。如罗马人,仅言己是,不言希腊人之过失处。现世英法人,亦仅言己是,而亦不言以往

罗马人之过失处。即如当前之美苏,亦仅能各言己是,而不能言英法已成过去之一切前非。但美苏自己不远将来,亦将自陷于过失中。故西方乃终不能有其如中国般之史学,乃使其人生常陷于过失中,而不能自拔。

孔子言: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孔子仅生七十二岁,但至七十始能从心所欲,而不见有过失。则其前七十年,岂不亦常在过失中。故孔子学不厌,即学求其少过。但中国亦仅有孔子一人为至圣先师,则其他人亦尽不如孔子,斯其毕生多过可知。学史功夫即在知过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试问春秋两百四十年,又谁一人能在无过中。孔子称:“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然又曰:“管仲之器小哉。”则虽管仲,又焉能无过。故历史多过,学史在求少过,直待天下太平,始为至善可止。则试问何日能达?故孔子之门人言,孔子之死,亦仅孔子之休息,尚待后学继起,续加努力。西方人只认各有长处,并日在进步中,此乃西方人之历史观。今日国人慕之,不论是非,不问过失,惟知求变求新,日趋进步。即如原子弹发明,亦是一进步,并是一大进步。但不仅不问进步之所止,亦不问进步之当前实况究如何。此为中西双方民生精神之不同,此即其既往历史,亦宜无可相同矣。

中国人言鉴古知今,西方人则贵开辟创造,求变求新。即当前之美苏,又当变,又当新。但新又如何?则非当前之所知矣。

又西方人重多数,故其历史亦惟重多数。而在中国则惟少数人能入史,能为历史人物。西方人既不重历史人物,乃有无历史人物,但只惟变惟新而已。故西方人论新旧,中国人则重褒贬。又少褒而多贬,即新亦可贬。又孔子前人言立德、立功、立

言为三不朽,但孔子则并此而不言,乃惟言一“学”字。过往历史,即在其所学中。而西方人则曰:“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。”师则可在历史中,而真理则多在历史外。故西方不重有史学。此一大要端,亦诚不可不深论。

今日国人好骂中国史,谓其全属过失,毫无进步。以另一观点另一角度言,此亦庶或有当。西方人因贵多数,多人所是即为是,多人所得即为得。时刻在求得中,此正当前西方民主社会乃有此,诚亦当前一史实。中国则重己重少数,孔子曰:“知吾者其天乎。”又曰: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。”但孔子作《春秋》,当为中国史学之开山,则宜其难为今日国人之崇慕西化者言之。

今日国人读中国史,亦必稍知中国之传统文化为如何。希读吾书者,其亦深思之。今试再易辞言之,中国人惟知爱重历史,故能蔓延扩张,以有今日。西方人只为不爱重历史,乃日趋分裂,亦直达于今。今日国人惟西方之是信是崇,乃亦分为两国,一崇美,一崇苏。明证当前,岂不与人以共鉴。愧使我当前之国人,仍能回头一读中国史,则此下宜分宜合,亦自当知所从事矣。余既为《中国史学发微》一书作序,意有未尽,再草此篇。

一九八七年二月钱穆识于素书楼

目 录

序一 1

序二 1

国史漫话(一九三九年) 1

中国史学之精神(一九五〇年冬) 26

史学导言(一九七〇年三月) 31

中国历史精神(一九八三年九月) 93

中国文化特质(一九八三年九月) 127

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之特长处(一九八六年四月) 164

历史与人生(一九八六年七月) 176

中国史学中之文与质(一九八六年八月) 186

民族历史与文化(一九八六年十一月) 193

中国教育思想史大纲(一九八四年夏) 201

庄子“薪尽火传”释义(一九八六年七月)	237
略论中国历史人物之一例(一九八六年十二月)	244
“国史馆”撰稿漫谈(一九八七年九月)	256
世界孔释耶三大教(一九七八年)	262

国史漫话

此稿成于云南宜良，在余《国史大纲》成书之后，继《史纲引论》发表于昆明之某报，张君起钩剪存之。携赴重庆，又转恩施，并挟之以赴北平。嗣又携此稿来台。辗转数万里，历时三十载。张君检以示余。余久忘之，重获展读，深感张君郑重此稿之美意。张君重欲将此稿刊布于《自由报》，特附识此一因缘以告读者。（一九六八年七月）

（一）国史规模的宏伟

去年五月中旬，始草《国史大纲》（以下简称《史纲》），迄今年六月成书。《史纲》辞尚简要，意有未尽，偶为漫话。

草《史纲》既竟，特标四信念于端，曰，凡读吾书，请先具下列四信念：

一、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，对其本国已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。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